

PAPER TRANS BY HE MINGHONG WORLD MASTER THINKERS



波 普

〔英〕勃里安·马奇 著
何明虹 译

波 普

[英] 勃里安·马奇 著

何明虹 译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张晓明

责任校对：跃 进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波 普

[英] 勃里安·马奇 著

何明虹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 年 8 月 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5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04-1370-X/B·306 定价：3.20 元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Bryan Magee

POPPER

First published in Fontana 1973

本书据芳塔纳出版社 1973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延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科学的方法——传统观点 与波普的观点	14
第三章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38
第四章	波普的进化论和他的世界 3 理论	67
第五章	客观知识	79
第六章	开放社会	92
第七章	开放社会的敌人.....	110
后记.....		141
参考书目.....		143
作者简介.....		145

第一章 导 言

毋庸置疑，卡尔·波普的名字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现在还算不上是家喻户晓，但这一事实需要加以说明。正如艾赛亚·伯尔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传记（1963年第三版）中所说，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包含有“现在活着的作者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最审慎然而又是最令人畏惧的批判”，如果这一论断大致可信，那么波普就是一位世界性的重要人物，因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一居民现在还在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的统治下生活着。撇开这一方面不谈，波普还是许多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的科学哲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梅达瓦（Peter Medawar）爵士 1972 年 7 月 28 日在英国广播

电台(BBC)第三台论述：“我认为波普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曾公开承认波普对他们研究工作的影响，其中有雅克·莫诺德(Jacques Monod)和约翰·埃克里斯(John Eccles)爵士，后者在他的《面对现实》(Facing Reality, 1970)一书中写道：“……我的科学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在1945年的转变，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归功于波普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诲……我曾尽力按照波普的方法来阐述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埃克里斯劝告其他科学家“阅读和深刻领会波普关于科学哲学的著述，并把它们作为科学生活的行为基础”。并非只是实验科学家持有这样的看法。著名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赫尔曼·庞第(Hermann Bondi)爵士曾言简意赅地说：“对于科学来说，没有比方法更重要的了；而对于科学方法来说，没有比波普所说的更重要的了。”波普的思想影响着从政府官员直到艺术史学家，其范围之广是在世的讲英语的哲学家没有一人能够匹敌的。在《艺术与幻想》(Art and Illusion)一书[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认为此书是他所读过的有关艺术批评的最好的书籍之一]的序言中，恩斯特·冈布里奇(Ernst Gombrich)爵士写

道：“如果读者能够感到波普教授的影响在本书中贯穿始终的话，我将引以为荣。”英国两个主要政党主张进步的阁员，如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和爱德华·波义耳（Edward Boyle）爵士，在他们政治活动中的见解一直受到波普的影响。

上述例子直接说明了波普著作在特殊领域内应用之外的一些重要作用。波普的学说与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的学说不同，对于受其影响的人们，它具有有一种显著的实践作用：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并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简言之，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并且，它的确对许多在各自领域内取得第一流成就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因此，人们很难说波普被忽视了。然而这就越发令人惊讶：为什么他的知名度低于许多次于他的思想家呢？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机遇，部分是由于对他的著作并非故意的歪曲，部分是由于他的方法对那些没有研究过的人容易造成误解。

卡尔·波普 1902 年生于维也纳。他在青少年时代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热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他还参与了左翼政治活动，在阿德勒（Adler）的领导下从事儿童社会工作，并且参加了勋伯格

(Schoenberg) 所创办的私人音乐协会。他像许多人一样，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和地方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当他的学生生活结束后，他作为一个教数学和物理的中学教师来维持生计，但他的主要兴趣仍然是社会工作、左翼政治和音乐，当然还有哲学。他发现，自己的哲学观点（打那以后他一直坚持这种倾向）与当时当地所流行的哲学存在分歧，这一哲学就是在他的同代人中风行一时的维也纳小组 (Vienna Circle) 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之一奥托·纽拉斯 (Otto Neurath) 给他起了一个“公认的反派”的绰号。这使得他陷入孤僻者的处境。他发现他的早期著作不能按原样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至今尚未出版；他出版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 1934 年秋出版，注明的日期是 1935 年) 是一个粗暴的删节本，删掉了原稿的一半。它包含了后来得到公认的，与逻辑实证主义论战的主要内容。

在 30 年代维也纳政治局势暴力冲突现象的背后，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趋于瓦解。后来，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第 2 卷, 164—165 页) 一书中，把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概述如下：

“既然革命必然到来，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促使革命发生的方式之一，在革命形势显已成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已经发生了革命，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正是民主所造成的虚幻的希望妨碍了革命。因此，法西斯主义摧毁民主只会使工人阶级最终消除对民主方式的迷恋，从而促进革命。基于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激进派自认为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因此，在法西斯主义者攫取政权时，共产党人没有进行战斗（更没有人指望社会民主党人会起来斗争）。由于共产党人确信，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即使法西斯主义的闹剧能够猖獗一时，但它维持不了几个月，因此，共产党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没有必要去损害他们的表演。法西斯主义在攫取政权时从未遇到‘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上述文字背后的历史现实中，是波普曾亲自卷入的关于政治策略和道义的令人痛苦万状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其日后许多政治著作的温床。他以令人沮丧的准确性预见到，奥地利将被纳粹德国吞并，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欧洲战争，战争中他的祖国将会站在非正义一边。于是他决定在此之前离开奥地利。（这一决定救

了他的命，因为尽管他在童年时就是新教徒，而且双亲都受过洗礼，希特勒还是会把他归入犹太人的。）1937年到1945年，他在新西兰大学教哲学。在这时期中的前一阶段，他事实上是在自学希腊语，为了研究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在这时期的中期阶段，他用英语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正如艾赛亚·伯林在前引书中所说：“这是一部极具创造性和力量的著作。”波普把这看作是他的战时工作。最后决定写这本书是在他得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消息的那一天，这个消息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着的。这件事以及1943年该书完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未定的事实，增添了他捍卫自由和抨击极权主义的激情。他试图通过这部书说明极权主义何以能发展并具有蛊惑力。此书在1945年以两卷本出版，使他首次在英语国家中赢得真正的声望。

1946年他来到英国，以后他就定居在那里。当他抵达那里时，他发现在英国如果说有一种流行的正统哲学的话，就是战前他在维也纳已经超越了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哲学流派是由艾耶尔（A. J. Ayer）通过《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1936年1月出版）一书引进英国的。波普自己的《研究

的逻辑》仍然没有翻译成英语，这里的人们实际上还不知道它；的确，至于人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儿，其内容通常也是被歪曲的，直到1959年秋天，即在德文初版问世四分之一世纪后，波普这部书的英文版才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为书名出版。在波普为该版本专门撰写的序言中，划清了他与当时最新流行的语言哲学之间的界线。但《精神》（Mind）这本语言哲学的主要刊物，却对波普的书进行了歪曲的评论，并只字不提波普新撰写的那篇序言。进入中年以后，波普再次发现自己在英国是个孤僻的人，正像青年时代他在奥地利一样。虽然孤独，波普还是早已赢得国际声誉，并且这种声誉正在不断扩大，他也得到了英国社会的承认（1965年他被授予爵士勋位），但无论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都没有请他当教授。作为逻辑学和科学方法教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了最后23年大学教书生涯。

在这些年中，他出了另外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论文集，其中大部分论文是以前发表过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在1957年出版时，阿瑟·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

道，这部书“可能是今年出版的书中唯一能够跨世纪生存的”。（收入此书的系列论文曾被《心灵》拒绝发表。）它可以被看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姊妹篇。同样，《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1963）可以看作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姊妹篇。他于1969年退休后，在1972年又出版了另一部论文集，名叫《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此外还可能有几本书将会问世，因为一些尚未出版的书的手稿已经完成；除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上百篇论文外，他还有甚至更多的论文和讲稿尚未发表过。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极不愿意让自己的著作立即付印，而愿意多花时间对它们不断地完善、修改和充实。

在波普学术生涯的初期，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他所关心的问题与他们自己所关心的是同样的，并且根据这一假设来解释他的著作。语言哲学家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因此而深信并断言他的著作一点也不像他所坚持的那样与他们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对他那种坚持极表厌烦。我将在适当时候再指出这一误解的

实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波普的著作贯穿着一个特点，当能够正确理解时，就不可避免地在他与他的读者之间达成共鸣，当读者还不能理解时，他就仅仅是一个潜在的读者。波普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其含义以后会完全清楚的），只有通过批评，知识才能进步。这一信念引导波普在对其他人思想的批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大部分重要观点。例如，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他的大部分观点是在对柏拉图和马克思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一代代的学生只是为了了解他的批评内容而争购这部书，但很少有人完整地阅读它。于是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批评柏拉图和马克思的书，因此许多听说过但没有读过它的人产生了误解。甚至有人以为，这是一部具有右翼倾向的书，因为它抨击了马克思。由此引起的学术争论不是集中在波普的正面观点上，而是集中在他对于别的哲学家的见解是否站得住脚上。整部整部的专著为此而撰写，如罗纳德·利文森（Ronald B. Levinson）的《保卫柏拉图》（In Defence of Plato）和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的《开放哲学与开放社会》（The Open Philosophy and The Open Society）。在学术刊物上，为波普对这一段或那一段